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西夏文化研究

史金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西夏文化研究

史金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文化研究 / 史金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161 - 3907 - 3

I. ①西… II. ①史… III. ①文化史—中国—西夏—文集

IV. ①K246.3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645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365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王 琪 刘 杨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自序

1962年我考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做研究生，师从著名西夏学专家王静如教授从事西夏研究。半个世纪以来，西夏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西夏研究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人，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衔接、分布于很多地区和部门的研究队伍；原来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现在已经有了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这样荟萃专业人员的机构；过去西夏研究资料稀缺，特别是流失海外的大量重要西夏文文献长期不为人所知，现在保存在国内和国外的西夏文和汉文资料已经出版或正在陆续出版；原来西夏研究著述寥若晨星，现在已经出版的专著数以百计，发表的论文数以千计，介绍西夏的科学纪录片也走进了千家万户；过去人们对西夏知之甚少，即便在学术界了解得也不多，西夏被称为“神秘的西夏王朝”，现在西夏不仅在学术界持续升温，普通人对西夏王朝也很关注，有人谈起西夏如数家珍。半个世纪西夏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西夏学已经成为覆盖多学科的重要学术领域，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西夏研究的众多成果凝聚着国内外专家们的辛勤劳动。

作为一名西夏研究人员，我亲历半个世纪西夏研究的发展，一方面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体味到学术界和社会对西夏研究的进一步期待。这种期待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专业研究人员不懈钻研、不断进取的源泉。

近50年来，我不曾离开过西夏研究，西夏融入了我的工作和生活，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西夏文是中国古文字的一种，因此我也关注着中国的其他古文字；西夏历史属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范围，因此我也涉足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但我始终把西夏作为我的研究重心。我写的文章和书，虽然也有关于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字的

著述，但多数还是有关西夏的内容。检索自己出版著作（包括合著）中一半以上属于西夏，发表的文章除序跋、书评等外，论文有 200 余篇，属于西夏研究的论文 150 篇。2005 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文集——《史金波文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之一种，其中收入论文 36 篇，皆为 2000 年前之作。

本次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论文集，我对发表过的论文作了筛选，《史金波文集》已收入的不收，在其他论文我选取了西夏文化方面的论文 20 篇，包括语言文字、文献、文物、科技诸方面。其余有关西夏社会、有关民族史和民族学的俟以后再出。

此次收入的论文，有的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写，有的则是近年新作。回顾已发表的论文，特别是早期的文章，因当时所见资料有限，有的资料是首次面世，那时还有新鲜感，但现在这些可能已是西夏学界唾手可得的普通资料。有的论文当时下工夫作了探讨，当时可能还有新意，但今天看来已是常识性知识；当然，有的论文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错误。尽管如此，我想将过去的论文集结出版可以起到便于同行查找、交流的作用，另外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夏资料不断积累、西夏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从中或许能透视出西夏学几十年来发展的一线轨迹。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从农村出来，依靠国家上了大学，很是幸运。但也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之虞。我们多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上学，国学功底疲软，比不上前辈；虽学外语，水准很低，又不及后人。我的学术道路平凡，学术贡献寥寥，充其量起到一点承上启下的作用。

几十年来我始终未离开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包括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没有离开过民族研究所，我入所时还是 20 岁出头的年轻人，在这里经历了中年，步入了老年。这里有我钟情的专业，有我眷恋的师友。我目睹、经历了我院、我所半个世纪的发展变化，衷心希望我院在新的形势下有更大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希望民族所在民族研究领域有新的进展，新的成就。

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使我深深感到学术进步离不开师长的教诲和指导，也离不开同事们的合作和帮助，更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和理解。

引导我进入西夏学殿堂的是我的研究生授业导师王静如先生。王先生

学贯中西，尤长于语言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日俄竞相研解西夏文时，先生出版《西夏研究》三卷，影响学界，并获法国如莲奖。先生教我学西夏文并不专门上课，只是告诉我有关书目，让我抄写西夏文著作。这种方法能使我独立思考，在当时很适合我的学业。为了学会历史语言比较，先生教我阅读法国语言学家梅耶撰写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一书，使我大开眼界。先生一生致力于西夏研究，是西夏学的权威专家，但他从不满足，直至晚年仍孜孜不倦地伏案研究。我每次到先生家时，先生都在书桌前整理西夏资料。先生 1990 年辞世，享年 88 岁。师母对我十分热情，她和我母亲同年，每次见到她都会问我母亲身体如何。先生去世后我每年都几次看望师母，师母去年离开人世，终年 96 岁。

翁独健先生是著名的蒙元史学家，青年时既作成《道藏子目引得》，功力深厚。所主持校点的《元史》，为学术界提供了《元史》的最佳版本。先生在民族所是分管民族历史研究的副所长。我先后任历史研究室的副主任、主任，后来又任民族所副所长，也负责民族历史研究室工作，作为先生的下属和晚辈经常到先生家请教学问，请示工作。先生原来住南池子大街，当时我差不多每月总有一两次去拜访。除业务组织工作外，先生对我的学业耳提面命，教我重视资料，重视目录，要求写作勤于思考，精于文笔。先生的睿智和思辨不断给我启迪。我多次参加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的研讨，先生宏观把握历史上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驾轻就熟，显示出大家的才略和魄力，使我受益良多。

王森先生是著名的梵文学家、藏学家，于藏传佛教、藏传因明学和藏族史十分熟悉。先生撰写的《西藏佛教的十篇资料》是第一次对西藏佛教系统、科学的研究，尚未正式刊布于世，即被广泛传诵。后以《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为名出版。我初接触佛学，遇难懂难解之处辄趋先生处求教，先生循循善诱地指引，并常从看似摆放杂乱的书堆中找出需要的书籍借我。元代庆吉祥编校的佛经目录《至元法宝勘同录》就是在先生家第一次见到。我撰写的第一篇有关佛教的论文即请先生过目修改。后我撰写《西夏佛教史略》书稿先生也检阅大半，并提出宝贵意见。先生平易谦虚，晚年撰写有关梵文贝叶经卷的论文，竟将手稿交我提意见。我自知才疏学浅，难以提出意见，但也不愿错过学习的机会。拜读后对先生知识之渊

博、功力之深厚、文笔之流畅更加崇敬。

季羨林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国学大师，是倡导建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领袖，一直被推举为研究会名誉会长。我负责主持研究会时，先生多次莅临学术研讨会致辞演讲。先生对西夏学关心备至，每每询问近况。2002年出版国家图书馆馆刊西夏学专号时，请先生题字，先生欣然允许。我如约到先生处取题字时，为不影响年事已高的先生健康，准备取到题字便离开。但先生精神矍铄，谈兴滔滔，论西夏，讲学术，谈猫趣，竟达40余分钟。想到先生家属和医生张贴在门外不准会客的通知，赶紧告别。我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西夏社会研究”时，曾向先生汇报。此项目成果《西夏社会》即将完稿时，先生十分高兴，欣然命笔，题写书名。该书出版后，我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先生，并将《西夏社会》送先生指正，先生十分欣慰，并高兴地摆上《西夏社会》与我合影。不想此次见面竟成永别。

另一位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是佛学研究领袖，关心西夏佛教研究。过去有关宗教、佛教辞典很少西夏内容。20世纪80年代我撰写《西夏佛教史略》时，曾给先生写信汇报，先生回信鼓励，并望该书早日出版。《西夏佛教史略》出版后先生又鼓励我继续深入研究。1998年先生筹划编辑佛教大辞典，欲填补西夏佛教空白，嘱我承担撰写西夏词条。适值我去日本讲学一年，未遑完成。俟我回国后，先生又指示敦促。我即放下其他案头工作，专心撰写西夏佛教词条，竟得110多条，总计5万余字。1932年北京图书馆曾出版西夏文专号，推动了西夏学进展。2000年我筹划于专号出版70周年之际，再出纪念专号以期进一步推动。先生作为国家图书馆馆长鼎力支持，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与国家图书馆合作编辑出版。先生不仅题字祝贺，还特撰写前言，热情勉励西夏研究同仁，并预言“我国的‘西夏学’必将呈现异彩”。在首发式上展览西夏文物，先生出席再行鼓励。

著名史学大师白寿彝先生尤重史学理论和民族史学研究。我每到先生处求教，都能从理论和方法上受益。后先生被推选为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我作为常务副会长到先生家请示工作更频。每当学会召开研讨会前，我皆向先生汇报准备工作，聆听指示。先生则从历史研究大势出发，指出

研究重点，所虑者长，所谋者大。先生晚年有目疾，不能外出，便写好会长致辞交我在会上宣读。为纪念先生 90 华诞，同仁编辑论文集以为庆祝，我应邀撰西夏风俗论文以贺先生。先生主编《中国通史》分册陆续出版，对我随出随赠。现每见书架上的 22 册巨著，如睹先生风采。

给我关怀、教诲师长辈学者屈指难数，所内还有傅懋勤、陈述、刘荣俊先生，院内有夏鼐、郭朋、熊德基、蔡美彪先生，京内有马学良、史树青、邓广铭、宿白、金启琮先生，京外有吴天墀、方国瑜、江应樑、马曜、方龄贵、林干先生等。前辈们对西夏学、民族史学和我本人的关怀、帮助，我总铭记于心，并思不辜嘱托，努力钻研。

谈及事业不能不提到我的夫人邵黎英。她是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本身工作繁忙，任劳任怨。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为了给我更多的时间，默默地负担起全部家务。我经常外出调查，家务更重，她从无怨言。她不仅是我的生活伴侣，对我关怀备至，同时也是我事业的坚定支持者。20 世纪 80 年代我和同事编写《文海研究》索引时，她和孩子们为我们核对字条号码索引。她退休后仍为我的工作操劳。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到日本做客座教授时，她悉心照料我的起居，还抽空帮我编写西夏文字索引。没有她的辛劳，我将诸事难成。我的著述虽列我一人名字，另一个未注明的劳作者应是我的夫人。

当前可庆幸的是在古代历史中西夏资料是增加最多的一个学科，社会各界对西夏学的关注使西夏研究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如果此论文集的出版稍有助于西夏研究，便不枉我院和出版社为此付出的心血。

史金波

2011 年 3 月 6 日于北京南十里居寓所

目 录

自序	(1)
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	(1)
西夏文辞书及其特点和历史价值	(11)
西夏文本《类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3)
《文海宝韵》序言、题款译考	(34)
西夏语的构词和词的变化	(48)
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	(62)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	(81)
简介英国藏西夏文献	(119)
西夏书籍的编纂和出版	(141)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社会文书残页考	(178)
中国藏西夏文文献新探	(196)
西夏文物的民族和宗教特点	(231)
河南、安徽西夏后裔及其汉化	(258)
西夏皇室和敦煌莫高窟刍议	(272)
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 ——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考	(284)
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汉文历书考	(297)

西夏度量衡刍议 (312)

鉴定早期活字印刷品的意义和方法刍议 (318)

最早的藏文本刻本考略 (332)

西夏的历法和历书 (343)

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

一

随着西夏文解读和研究的进展，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西夏语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在西夏语常用词中，这些借词约占百分之十。这仅仅是据书面文献的大致统计，在口语中汉语借词数量可能会更大。这些汉语借词已经成为西夏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当时的西夏人在多种不同类型的西夏文字典中，收入了这些借词，并按其读音分门别类地归入相应的西夏语声类、韵类之中，从而把汉语借词的声韵纳入了西夏语的语音体系。这不仅反映了汉语借词在西夏语中的稳定地位，也表明了当时的西夏人对汉语借词的重视程度。

为什么作为西夏王朝主体民族的党项人所操的语言（即西夏语）中会有这样多的汉语借词呢？这首先要从 11 世纪或更早时期党项人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找原因。党项族原住四川西部、青海东部一带，公元 7 世纪以后，由于毗邻的吐蕃势力强大而被迫北移。^① 他们由四川入甘肃，达宁夏、陕西北部。这里经各族人民世代开发经营，已成为生产水平较高、农牧业兼得的地带。这一带距中原不远，早有大批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党项人进入这一地区之后，随着自身社会的发展演化和越来越多地接触汉族较高的社会生产方式，使党项族社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量新事物的出现必然反映在西夏语中。党项人除利用母语中原有词素构成新词来反映这种新事物以外，还直接从汉语中借用大量现成的词。可以说，党

^①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6215 页。

项人这一迁徙是西夏语大量吸收汉语借词的主要条件之一。

西夏王朝在其立国前的唐末、五代时,就已经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地方政权,受中央王朝统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受到汉族的直接影响。西夏正式立国后,仍和宋朝交往甚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西夏统治势力范围内包括多种民族,其中主要是党项人和汉人。党项人不仅从事传统的畜牧业生产,也有很大一部分人逐渐定居在州城附近或宜农地区,和汉民一样经营农业,当时称“熟户”。他们与汉族人民或混居一起,或本民族小聚居而与汉族大杂居。就是在统治集团内,也是党项人、汉人分任政府各种职官。在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上除保留了部分民族特点外,也大多因袭了唐、宋的典章制度。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的父亲德明时就曾向宋朝求赐汉文佛经。元昊本人通悉汉文,他在政府机构中特设蕃字、汉字二院。汉字院专掌与宋朝的往来表奏。毅宗谅祚时改用“汉礼”,并向宋朝求赐《九经》。崇宗乾顺时更设国学,系统教授汉文。仁宗仁孝时重大汉太学,尊孔子为文宣帝,汉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①这样,两个民族就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直接的、广泛的交往。西夏语和汉语在境内同时行用。西夏建国前后的特殊政治、历史环境是西夏语中进入大量汉语借词的主要原因。

西夏文创制以后,在使用和流传过程中,有大量的常用汉语借词被收录于西夏文文献中,大大增强了借词的稳定和流传。西夏时期编印的西夏文字典《音同》、《文海》中收录了很多汉语借词,并置于西夏语语音体系中统一编排。西夏时期还刊印了两种特殊的字典。一种是西夏语—汉语双解语汇本《番汉合时掌中珠》,为西夏人骨勒茂才所著,其序言用西夏文、汉文两种文字写成。作者明确提出:“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番即指党项。作者对党项族、汉族互相学习对方语言的必要性作了概括的说明。他把《掌中珠》中每一个词语分为四项:(1)西夏文,(2)相应的汉译文,(3)用汉文为西夏文注音,(4)用西夏文为汉译文注音。这就十分便于

^① 《宋史》卷四八五、四八六《夏国传》上、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981—14033页。

两个民族学习对方的语言和文字。另一种是名为《要集》的特殊词典，其中每一西夏文词语都用汉语解释，但这种解释并不直接用汉文，而是用为汉文注音的西夏文。如西夏文义为“坍塌”的词，用读音分别为“乾”（“干”的繁体字）和“郭”的两个西夏字注释（参见附录1）。^①字典为汉语注音既适应了当时党项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的需要，还进一步推动了汉语借词的发展。如《掌中珠》中职官名称“中书”一词系本语词，音〔酪腮〕。到了元代，有的文献中“中书”二字直接借自汉语，原来在《掌中珠》里为汉字“中书”注音的两个西夏字，就成为记录“中书”这一汉语借词的文字，读音为〔酪腮〕的本语词已经不用了（参见附录2）。^②西夏时期用西夏文翻译了大批汉文著作，如《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贞观政要》等。还从汉文翻译了三千余卷佛经。翻译时，又增加了一批汉语借词。如卿、大夫、公、侯、伯、子、男等（参见附录3）。可以说，西夏文化事业的发展，及其和汉文化的交流，大大推动了汉语借词的发展。^③

二

西夏语中汉语借词范围很宽。以词类划分，数量最多的是名词，其次是动词、形容词，还有一些是数量词、方位词等。现把部分汉语借词分类列举如下：

（一）名词

鼎 山〔山〕、 瓶 川〔川〕、 双 岔〔茶〕、 查 谷〔姑〕、 瓶 障〔张〕、
瓶 坎〔看〕、 瓶 关〔关〕、 瓶 海〔海〕、 瓶 泊〔破〕、 瓶 滩〔耘〕、
瓶 沙〔沙〕、 瓶 波〔播〕、 瓶 坑〔坑〕、 瓶 电〔田〕、 瓶 州〔州〕、

① [日]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3卷，第66页。史金波：《简略西夏文辞书》，《辞书研究》1980年第2辑，第250、253、260页。

② 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第74页，译文注释26。

③ 在汉语对西夏语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西夏语也必然对汉语产生一定影响。汉文的历史文献中就记录着西夏语借词。此问题当另文讨论。

甌	府〔富〕、	𦰩	县〔玄〕、	𦰩	堡〔宝〕、	𦰩	寨〔豺〕、	𦰩	楼〔楼〕、
𦰩	陵〔楞〕、	𦰩	哥〔哥〕、	𦰩	女〔女〕、	𦰩	婢〔备〕、	𦰩	奴〔奴〕、
𦰩	使〔使〕、	𦰩	身〔申〕、	𦰩	脑〔那〕、	𦰩	膊〔膊〕、	𦰩	疤〔八〕、
𦰩	腋〔能〕、	𦰩	羹〔崩〕、	𦰩	物〔五〕、	𦰩	车〔车〕、	𦰩	矢〔湿〕、
𦰩	兵〔兵〕、	𦰩	钉〔丁〕、	𦰩	炉〔路〕、	𦰩	管〔管〕、	𦰩	窠〔看〕、
𦰩	龙〔龙〕、	𦰩	鹤〔鹤〕、	𦰩	茎〔经〕、	𦰩	枝〔枝〕、	𦰩	花〔花〕、
𦰩	松〔松〕、	𦰩	杏〔杏〕、	𦰩	桃〔诺〕、	𦰩	豆〔湊〕、	𦰩	牌〔败〕、
𦰩	食〔湿〕、	𦰩	酒〔酒〕、	𦰩	价〔嫁〕、	𦰩	财〔财〕、	𦰩	功〔功〕、
𦰩	僧〔僧〕、	𦰩	寺〔寺〕、	𦰩	梵〔梵〕、	𦰩	味〔为〕、	𦰩	汗〔汗〕、
𦰩	郎君〔郎君〕、	𦰩	𦰩〔皮、西〕、	𦰩	𦰩〔空、侯〕、	𦰩	和尚〔和尚〕、	𦰩	𦰩〔汗〕、
𦰩	𦰩〔烟、知〕、	𦰩	𦰩〔京、六〕、	𦰩	和尚〔和尚〕、	𦰩	𦰩〔磨、竭〕、	𦰩	𦰩〔汗〕、
𦰩	沙门〔沙、门〕、	𦰩	𦰩〔易、吟〕、	𦰩	𦰩〔磨、竭〕、	𦰩	𦰩〔磨、竭〕、	𦰩	𦰩〔磨、竭〕、

(二) 动词

𦰩	赴〔干〕、	𦰩	拦〔兰〕、	𦰩	过〔过〕、	𦰩	使〔使〕、	𦰩	输〔输〕、
𦰩	转〔转〕、	𦰩	用〔瑞、改〕、	𦰩	搏〔斗〕、	𦰩	弃〔岂〕、	𦰩	遣〔宜〕、
𦰩	拭〔使〕、	𦰩	钻〔赞〕、	𦰩	生〔生〕、	𦰩	长大〔长〕、	𦰩	栽〔灾〕、
𦰩	织〔植〕、	𦰩	踪〔全〕、	𦰩	比〔笔〕、	𦰩	成〔成〕、	𦰩	说〔说〕、
𦰩	知〔知〕、	𦰩	憎〔曾〕、	𦰩	垂〔香〕、	𦰩	累〔雷〕、	𦰩	渗〔参〕、
𦰩	爆〔豹〕、	𦰩	散〔三〕、	𦰩	分〔分〕、	𦰩	禅〔扇〕、	𦰩	谤〔咄相〕、
𦰩	涅槃〔涅、盘〕、								

(三) 形容词

𦰩	大〔大〕、	𦰩	粗〔醋〕、	𦰩	细〔斜〕、	𦰩	正〔正〕、	𦰩	斜〔斜〕、
𦰩	曲〔曲〕、	𦰩	匀〔余、轮〕、	𦰩	完〔吴、孙〕、	𦰩	全〔全〕、	𦰩	碎〔酥、魁〕、
𦰩	强〔康〕、	𦰩	贵〔贵〕、	𦰩	羞〔修〕、	𦰩	香〔香〕、	𦰩	闻〔闻〕、
𦰩	胜〔石、争〕、	𦰩	灰〔胡、鬼〕、	𦰩	红〔红〕、	𦰩	昏〔昏〕、	𦰩	愁〔含〕、
𦰩	顽〔顽〕、	𦰩	同〔托〕、	𦰩	明〔明〕、	𦰩	杂〔噎〕、	𦰩	败〔迷、背〕、

(四) 其他

𦰩	寸〔寸〕、	𦰩	𦰩〔盈〕、	𦰩	卷〔卷〕、	𦰩	三〔三〕、	𦰩	双〔双〕、
𦰩	内〔内〕、	𦰩	南〔南〕、	𦰩	正〔月〕〔张〕、				

这些借词^①从其来源和使用范围上，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由于社会的发展、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产生的借词。如经略、通判、使、府、州、县、堡、寨等。(2)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演进出现的借词。如簸箕、秤、寸、镒、杏等。(3) 由于与汉族过从甚密，一些反映日

① 上表方括号汉字为西夏文注音字，若为两字，中以顿号分开者为两个音节，中无顿号者为反切上下字，下有一横线者为鼻冠音。下同。